

呼愁情结（江江整理）

帕慕克的自传性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卷首语引用了阿麦特·拉希姆的话“美景之美，在其忧伤”。忧伤在土耳其语中就是“呼愁”。在这部回忆录小说的第10节出现一个引人注目的词——“呼愁”（huzn），帕慕克在该小说中更是专门辟出两章来谈论“呼愁”，可见“呼愁”在其作品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在其作品中的重要地位。

一、“呼愁”的概念

（一）“呼愁”的含义

1、在土耳其历史文化、宗教、哲学传统语境中，“呼愁”一词是土耳其语“忧伤”之意，原指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

它根源于阿拉伯伊斯兰教，在《古兰经》中两次写作“huzn”，三次写作“hazen”，当年穆罕默德的妻子哈蒂洁和伯父塔里涌去世，穆罕默德把那年就称作“Senetül hüzün”，也就是“忧伤之年”。

帕慕克还认为在伊斯兰的历史中，“呼愁”呈现为哲学意义上的两个传统：

（1）**伊斯兰教传统**。即世俗享乐和物质利益追求过多时所体验到的呼愁，因为伊斯兰教主张真正的教徒不应过多在意人世间的得失。

（2）**苏菲神秘主义思想**。是指“不够靠近真主阿拉，因为在这个世上为阿拉做的事不够而感受到的精神苦闷”，“由于与真主阿拉永远不够接近、对阿拉领悟得永远不够深刻，使人倍感哀痛、空虚、欠缺”。在苏菲派的思想中，“呼愁”具有了一种光荣的色彩，深受推崇。

这两个传统影响了土耳其文化与历史，特别是伊斯坦布尔城的历史文化，“呼愁”成为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之一，成为土耳其诗歌的基调之一。而在帕慕克看来，这一强烈的“呼愁”感，与奥斯曼帝国毁灭的历史密切相关，这一历史映射在伊斯坦布尔的城市风景及人群身上，形成了土耳其人共同的思想状态：“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仅是由音乐和诗歌唤起的情绪，也是一种看待我们生命的方式，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思想状态，最后既肯定亦否定人生。”

2、是医学、心理学与哲学意义上的“呼愁”，涉及生理、心理、精神文化方面，在这个层面上帕慕克探索了这个词的起源。

伊斯兰医学家、思想家金迪（El Kindi）、医师哲学家阿维森纳（Ibn Sina）等把“呼愁”看做一种疾病，死去亲人的痛苦，还有各种精神磨难；医学家伯顿在其作品《忧郁的解剖》中把它称为“黑色痛苦”，将对死的恐惧、爱、失败、恶行与各种食物列在一起，寻找治疗方法，从而使

医学与哲学进一步结合,孤独和忧伤成为伯顿关注的重点。

从这些人的观点出发,帕慕克得出结论认为:“呼愁”起源于和忧伤一样的“黑色激情”,根源于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发现的基本体液——黑胆汁,并指通常与这种感觉联系在一起的颜色及其暗示的滞塞之苦。帕慕克所说的黑色激情,就是古希腊词语“melan-cholia”——黑胆汁,词根 melan 意为“黑色的”,kholi 意为“胆汁”——作为一种疾病是指是因黑胆汁过多而引起的,以精神郁闷、低沉及怒气猛烈爆发为特征的一种精神状态。后演化为英语中的“melancholy”一词,为“忧郁、悲哀或情绪低落,郁闷,沉思”之意。

3、西方旅行者和作家视角下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忧伤。

这些西方人视角对后来的土耳其诗人、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时期,在西方人眼里君士坦丁堡(后来的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与浪漫情调的地方。

比如,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法国的骑士传奇和回忆录就多次写到君士坦丁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维尔阿杜安在 1212 年完成的回忆录《君士坦丁堡征服记》(1657 年出版),记述了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的过程。1697 年,路易十四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费里奥尔先生,曾把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姑娘带回法国,作家普雷沃神父(1697—1763)据此写出了富有浪漫色彩的小说《一个现代希腊姑娘的故事》(1740)。

至 19 世纪,欧洲作家,特别是法国浪漫派作家纷纷踏上了东方之旅,寻找异域世界的情调,不少人在伊斯坦布尔留下了足迹。

1850 年 10 月,作家福楼拜来到伊斯坦布尔时,则发现“伊斯坦布尔不是他要寻找的东方”,他在贝鲁特患上的性病令他苦恼不已,肮脏的妓院、阴沉的墓园成为他的兴趣所在。

1852 年,法国诗人戈蒂耶到伊斯坦布尔旅行时,则发现了城里的某些景色“忧伤之极”,“在脏乱之中发现了忧伤之美”。他真实地描绘了从偏远的贫民区穿过的拜占庭废墟,详尽地表述了城墙的破败与裂痕,破碎的残片,枯燥沉闷的环境,以至于对这一幕幕“忧伤之极”的景象发出感叹:“殊难相信,这些死寂的城墙后头存在着活生生的城市!”

帕慕克在戈蒂耶这里找到了“呼愁”的共鸣,从 1850 年到今天,一百五十多年了,伊斯坦布尔的“忧伤”、“呼愁”由西方人发现,至今已经沉淀成形:“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我肯定‘呼愁’不仅统治着伊斯坦布尔,而且已扩及周围地区。我一直想说明的是,我们的‘呼愁’根基于欧洲:此概念首先以法语(由戈蒂耶而起,在朋友奈瓦尔的影响下)探索、表达并入诗。”

4、土耳其本土作家视角下的“呼愁”。

帕慕克考察了起源于西方的“呼愁”之后,同时考察了“呼愁”在土耳其作家、学者身上的表现,他们置身于土耳其文化当中,与西方作家的感受有明显不同。

帕慕克列举了四位有代表性的孤独忧伤的作家:诗人雅哈亚、历史学家科丘、小说家坦皮纳、记事散文家希萨尔。从他们的作品中,帕慕克清楚地认识到“呼愁”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灵魂”。四位作家都是处于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关系中的人,都深受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把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在一起。

帕慕克认为,他们找到的共同主题是奥斯曼帝国文明衰退的历史。这一衰落的历史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中表现出来,描绘伊斯坦布尔的过去、废墟、往日之美的失落就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的声音”。他们回顾城市昔日的光辉,关注衰败之美,赋予过去以灿烂的诗意,同时又不得不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同政治主张、不同宗教信仰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们可以拥抱城市的忧伤以分享社群精神,同时透过西方人的眼光看待伊斯坦布尔,以求表达这种群体忧伤、这种“呼愁”,显示这座城市的诗情。在这些作家身上,“呼愁”已成为一种个体的精神风格与艺术风格。

帕慕克的“呼愁”风格与这四个层面有着密切的历史继承关系。

(二) 忧伤与“呼愁”

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书中,帕慕克强调“呼愁”的含义与忧伤很接近,那么,“呼愁”究竟指的什么呢?与忧伤有哪些区别呢?

忧伤与“呼愁”的关系是既相似又是有很多区别的。

相似之处在于:忧伤与“呼愁”都是表示内心的一种伤感情绪,都是人类真实情感流露;都是源于“黑色激情”,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及的黑胆汁体液。

区别之处在于:

首先,忧伤表达的是个人的伤感情绪,而“呼愁”表达的却是数百万人的集体情绪;

其次,忧伤是由一定的外在事件引发的内心体验,不一定是个人自愿承受的忧伤;而“呼愁”某种程度上是伊斯坦布尔人资源承载的情感体验;

最后,忧伤的起因不会源自宗教因素,没有特定的背景;而“呼愁”是起源于伊斯兰教,具有特定的背景环境,并最终由宗教引向世俗化意义。

二、帕慕克作品中的“呼愁”主题

传统与现实的矛盾、东西方间的冲突以及自我与“他我”的争斗的思考正是帕慕克创作

的主轴,也是他在作品中一直想探讨并希望得以解决的主要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其作品中的“呼愁”主题。

(1)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也就是保守与西化的问题,贯穿于帕慕克的全部作品,是构成帕慕克“呼愁”的主要因素之一。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是,现在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日益激烈,而帕慕克的作品就描述并试图解决这一冲突。

《雪》发表于2002年,是帕慕克的第七本小说,故事发生在1992年的四天四夜中。主人公卡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了土耳其的一个偏远小镇卡尔斯城。他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本来是来此地寻找恋人伊珂的,却不意卷入了一场政治和宗教、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之中,这些冲突将小镇人们分成两极。

其中最能体现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是关于妇女要不要戴头巾的问题,围绕这一争议形成了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两派:传统派和现代派。这种派别斗争非常激烈,以至于差点酿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我的名字叫红》讲述了一个1590年的九天时间里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故事,它既是视觉隐喻的杰作,也是一曲已失去的视觉叙述的挽歌。该小说不仅关注细密画传统,尤其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细密画传统,而且也关注西洋画传统,其中最独特的是西方绘画传统与伊斯兰绘画传统的对立。

(二) 东西方间的冲突

从地理方位而言,土耳其地跨东西方,受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双向影响,土耳其人民在生活中深切地体会着两种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因此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碰撞、冲突和融合也就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帕慕克的作品不但要反映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还其作品中探讨怎样解决这一冲突,希望对此冲突进行融合。

《雪》是一部关于土耳其东部城市雪城——卡尔斯市政治生活的小说,表现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剧烈冲突。小说作者通过一位到访的带有西方背景的诗人的眼光,发现作为一个土耳其艺术家会觉得同东西方两种文明都有深刻的联系,对哪一边表示效忠都不可能。这同时也表明了作者自身的态度。

《我的名字是红》的主题也牵涉到了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东方的伊斯兰绘画艺术(细密画传统)和西方的肖像绘画艺术(西洋画传统)之间的冲突,也体现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该小说堪称书写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文本。帕慕克在该小说中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自己的祖国,特别是自己的故乡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和文明的地位、属性与未来发展的思考。这是一个现实的、亟待解决却难以解决的问题。阅读《我的名字叫红》会让人感

受到这样一种深沉的文化“呼愁”。

《新人生》也是一部关于土耳其失落的民族文化和智慧的寓言,东方和西方文化融合、误解、紧张的精神漫游史。在《新人生》的中文版序言中,作家宣称“在我所有的小说中,都有一场东方与西方的交会”,他也提到:“东方与西方的交会,并非如人们以为的是透过战争,相反地,一直以来,它都是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中,透过物品、故事、艺术、人的热情与梦想进行。我喜欢描述人们生活中此种互动的痕迹。在当中,我看见东方与西方寻求互相了解、互相争战,或是彼此融合妥协;我看见人们的灵魂在这两种传统的影响下受到撼动或改变。这让我深受感动,就如同沉醉于爱情的初始、凝望着自然美景,或是浸淫于历史的美好点滴。”

(3) 自我与“他我”的争斗

自我与“他我”,或说身份认同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着帕慕克的一大主题。他的所有著作都无一例外地描述了这一主题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反应。

《白色城堡》的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个人(自我)和另一个自己(他我)在异域的遭遇。这种自我和他我的奇遇,一直以来都是中西方哲人和作家们思考并在其作品中极力想要表达的问题。一个人在历史和时间的迷雾中(这类似于普鲁斯特的“寻找失去的时间”),如何遭遇自我和他我对话,又如何与自我分离,是这些哲人和作家均想探讨的问题,也是帕慕克在《白色城堡》中想要探讨并告诉读者的问题。

三、“呼愁”的诗学意蕴

纵观帕慕克的所有作品,我们发现,“呼愁”是他写作的主要艺术风格,它表现在每一位主人公的身上,渗透于每一个故事、寓言中,潜含于每一处风景与意境内。这是一种情与景合、意与象通的文化诗学意境。

(1) “呼愁”之人

在帕慕克的笔下,“人”的“呼愁”是如何体现的呢?

1、孤独感。孤独是帕慕克小说主角的共同特征之一。以卡为例。在《雪》中,主人公卡是一位诗人,常年漂泊在外、四处流浪,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亲人。在政治上,他既不是一个纯正的世俗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而是一个彻底的边缘人。他总是沉默寡言,烟不离手,总是一个人徘徊在雪夜的暗巷,不断地思考,不停的行走。⁸此外,黑、卡利普等小说主人公也一样,他们可能是有亲友的,但在心灵上,他们是一模一样的隐士。孤独是他们永远摆脱不掉的弃世病。

2、失落感。这里的失落既指人生的失意,也指心灵上的沮丧状态。在帕慕克的小说

主人公中,很少有人是如意的。卡:一个13年写不出一首诗的流浪诗人。凯末尔:一个苦恋了一辈子的鳏夫。卡利普:一个失败的侦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断的失意给他们的生命注入了一种哀伤之气。在时间的河流中,他们不在乎现在,也不期盼未来,永久地沉湎于过去的记忆中,难以自拔。

3、死亡。如果说他们生前毫无欢乐可言的话,那么,他们的死亡也同样是痛人肺腑的。意外、不幸的死亡是帕慕克小说主人公的共同结局:奥斯曼30多岁死于一次意外车祸,卡40岁在异乡被恐怖分子枪杀,卡利普成为另外一个人——另一种死亡,橄榄死在哈桑的剑下……此外,他们高大、瘦削的身影,深重的理想主义情结,满怀愁绪与迷茫的面容,等等,都是他们得以成为忧伤之人的重要原因。

(二) “呼愁”之故事

1、在帕慕克的笔下,从不缺失动人的爱情,但往往表现得凄婉动人、催人泪下。奥斯曼与嘉娜(一个死于车祸,一个在异国相思),黑与谢库瑞(远隔千山万水的一对恋人),卡与伊佩河(一个死在他乡的诗人,一个美丽而忧郁的女人),卡利普与如梦(一个神秘消失,一个苦苦追寻),等等。

2、在帕慕克的每一部小说中,都有一个文化冲突的故事。它们的内容不同,形式、手法也各异,如细密画与透视画之争,苏纳伊与神蓝的对抗,塞拉哈亭与妻子法蒂玛的争吵,等等。虽然这些冲突有群体/个体之分,有社会/家庭之别,但它们的后果却是一样的——无数的人在其中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3) “呼愁”之景色

忧伤之景——帕慕克的置景。帕慕克说:“美景之美,在其忧伤。”(flyleaf)这是艾哈迈特·拉西姆(Ahmat Rasim)的句子,也是帕慕克慕景诗学的总结。

帕慕克写过的城市并不多,写得最多的是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黑书》、《新人生》、《我的名字叫红》、《纯真博物馆》等作品均是以这座城市为背景的。在这座城市中,布满帝国残破的遗迹,每一个行人的脸上都挂着忧愁、阴郁,以及漫天飞扬的雪花,以及衣衫被褛的乞丐、四处逃窜的狗群。**这一切诉说的都是一座城市的忧伤。**

《雪》不是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卡尔斯,《白色城堡》不是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盖布泽、埃迪尔奈,但我们却可以看到一样的忧伤之景:“昏暗的灯光”、“狂犬不知的狗”、“空荡荡的广场”例、“龟速前进的破烂牛车”……为什么?因为帕慕克是一个忧伤的人。

在季节上,他甚少写春、夏二季,多写秋与冬,尤其是雪景。在建筑上,帕慕克多写古老、破旧的帝国余迹,而非现代的公寓大厦。在家庭上,帕慕克多写贫穷的族裔,或是富人的内在空虚。

所以,在帕慕克的小说中,感受“呼愁”,只需“观看一幕幕景象……城市本身在记忆中成为“呼愁'的写照与本质。”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穷、破败、孤立。” [2]

“这个城市不仅给了我，而且给了上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所有的人一种特别的伤感、忧郁，我们土耳其人称其为‘呼愁’。这是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由于位于欧洲边缘却生活在贫困之中，于是产生了一种人生的感觉和哲学，它意味着我们永远也不会成功，不会富有。”

——奥尔罕帕慕克